

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1919年4月23日至27日，《国民公报》连续转载了署名为“渊泉”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的《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的长文，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事迹，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空前绝后之名著”、早期近代世界社会主义者的“圣经”。作者还翻译了马克思夫人给朋友的信，叙述了马克思研究社会主义，把一生贡献给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高尚品德。作者称：“马氏之大著作告成，就于此种境遇之中，此殆天所以造就马氏者也”。4月29日，该报又刊载了“渊默”的《我对于反对新青年者之希望》一文，对那些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歪曲为“倡共产主义之说，即懒人之要义也……不务正业谋所以生财之道而欲共他人产业”的言论，进行了批驳。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公报》对马列主义的介绍与日俱增。5月13日至16日，该报连续转载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解释》一文，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既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是法国的劳动者大同和美国的劳动者大同主义，而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学说在现代各种社会新思潮中，可算得最稳健的主张，最有科学的基础”；今日之资本主义制度，在科学上实无存在之根据，而生产公有，实为颠扑不破之科学主张，“社会革命实行公有以外，别无他途可言”^①。这篇文章还简要介绍了列宁1918年1月16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5月30日至6月12日，《国民公报》还以《欧战常识》为名，连续转载了“知非”撰写的《何为过激党》的文章，介绍了列宁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的成功，并节录刊登了1917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列宁的文章。接着在12月15日，又刊登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施政纲领，介绍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俄国革命失败的情况等；12月24日，刊载了署名为“想众生”翻译的《马克思小传》，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组织共产主义同盟、《共产党宣言》对世界革命产生的重要影响等。《国民公报》在川独一无二地、比较全面地刊载介绍

^①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四川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在四川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成都《国民公报》之后，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在其会刊《星期日》周报上，也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后的觉悟》、《波尔雪勿党的教育计划》（“波尔雪勿”即布尔什维克的译音）、《社会主义的劳动问题》等文章。该刊1919年12月出版的第22和24期上刊出的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直接说，就是废止私有财产制度，以共有社会财产制度为社会的基础。要是私有财产不能变更，社会的生产形态和私人所有形态的冲突，是不会停止的，那么，劳动问题也不能有合理的解决”；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福音，对我们现在中国争斗的救济，尤其剀切——要紧。我们应当欢天喜地，争先恐后地欢迎”。^①当然，《星期日》对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宣传还属于一般新思想的介绍。正如李劫人所说：“当时成都会员的思想还相当统一，即是说，对于现状都非常不满，都有一种爱国热情，都不再相信18世纪法国式革命能够救中国，但对于苏联革命的成功，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得不到许多资料作深入研究，仅止朦朦胧胧认为是一种崭新东西，值得欢迎而已”。

1920年春，《东方杂志》等刊物将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刊登出来后，《新青年》刊登了社会各界的反应。这一消息的发表，在四川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人们赞赏苏俄政府的这一立场，对深入了解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同年，成都的《半月报》在宣传无政府主义及各种新思潮的同时，连续刊登了一些比较全面介绍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在第12期上发表了署名“希宋”的《劳农政府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一文，在四川较全面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过程和原因。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呼声，轰轰烈烈，沸腾了全世界；在俄国却已着手根本改造了，这也是物

^①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四川的建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极必反，自然的趋势”，“我认定中国现今的情形与俄国革命前的种种事实很相同的。”“我们想解救人类，恢复社会的实质，非社会革命不可。”在第13期上，又刊登了《对于集产主义及劳农俄国的怀疑》一文，对苏俄受到列强的经济封锁表示同情，说：“因缺乏粮食攻击他，我却不赞成，并可以替他们申辩，俄在欧战后，人民受到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又经数次革命，就不封锁已够贫困，因而反对列强封锁。”第15、16期登载了海参崴共产党果尔克氏写给远东少年的一封信《告远东少年》，信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信中最后介绍了苏联共产少年同盟会的组织已在国内各地建立，号召远东少年组织起来，建立共产少年会，参加少年共产国际，“共同协力互助，创造天下的大同共产社会”。

此外，成都的《川报》、《戊午周报》、《四川学生潮》、《威克烈》、《直觉》、《新空气》等刊物，也都先后刊登过介绍马克思及其生平和思想的文章。

四川早期的团体和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宣传，还只当作一种新思潮、新学说来向民众进行介绍，不免粗浅、片面，存在不少不准确甚至错讹的地方，更谈不上自觉的、全面而系统的宣传。但是，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正是通过这些团体和报刊的宣传，为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并予以传播和运用于指导革命的实践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王右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王右木是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王右木，1887年出生在四川省江油县（今江油市），辛亥革命后曾留学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组织“神州学会”，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学生运动。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施存统等先进知识分子，并受到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等人的影响，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王右木回国返川后，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监、经济学和日语教师，并先后在高师附中、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兼课。受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等报刊的影响，王右木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兴趣。

1920年春夏，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推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同年暑假，王右木前往上海会见了陈独秀等人。受陈独秀等的委托，他回到成都后，于年底创办了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开始在四川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初，读书会的成员约40余人，多为王右木的亲朋好友和同乡。但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兴趣，数次活动后坚持参加读书会的只剩下几人。1921年春，王右木重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主要吸收成都高师等大中专院校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以及个别工人。读书会的活动主要是阅读《新青年》等报刊和宣传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结合当时的社会问题开展讨论，并利用纪念日举行讲演会。王右木自费订购《新青年》、《觉悟》和《东方杂志》等进步刊物，手抄、油印了《共产党宣言》供大家学习，并时常给会员们讲解《资本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精髓》等著作的精神，还要求会员向周围的朋友宣传革命理论。参加读书会的人员不断增加，最多时曾达百人以上。在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研究革命理论的同时，王右木自身的思想也实现了飞跃，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1922年2月7日，王右木创办并主编《人声》报，意即人民的呼声。他在创刊号的《本社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宣布《人声报》的宗旨是：“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对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现象，尽力的揭露和批评以促进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注重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行动；讨论马克思社会主义之学术及实际的一切问题；讨论新社会之一切建设问题”。《人声》报出版后，深入浅出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原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俄及国际工人的运动。王右木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其“可免却世界资本主

义的压迫；立可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立可阻止军阀构兵；可救济财政破产；可减轻人民的痛苦；可使人民的精神及物产生活渐次安固；可促进世界和平”^①。《人声》如此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在当时的四川是仅有的。《人声》报还批判了杜威、罗素、柏格森和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实用主义，以及当时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报纸还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封建军阀主张的“防区制”，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并对妇女解放和青年运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人声》报的影响不仅限于成都地区。原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张秀熟、袁诗尧等进步青年，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顺庆（今南充市）教书。他们作为《人声》报的特约通讯员和代办员，每期在南充代售二三十份，使该报在当地的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流传，使川北地区的部分青年开始初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王右木还帮助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走出思想认识的误区。五四以后，各种新思潮如潮水般涌入四川，各种主义也在社会上流行。其中，在青年中最有影响的是克鲁泡特金主张的无政府主义。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因而很适合他们的口味。无政府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统治，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宣传新思想、新思潮的过程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些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当时，成都、重庆的一些青年学生先后建立了“均社”、“平平学会”等无政府主义团体，并创办了《平平》、《星星》、《半月报》、《警群》等报刊，宣称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无强权、无国家、无政治、无法律、无武力、无私产、无宗教、自由生产、自由消费、智能均等”的“平等、博

^① 《人声》报，1922年2月7日。

爱、自由社会”。在成都的《半月报》被当局查封后，编辑刊物的学生又创办了《平民之声》，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警群》月刊还出版了一期《克鲁泡特金专刊》，载有《克鲁泡特金所反对的》等文章，论述波尔扎维克（即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并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不少知之不多的青年人，认为克鲁泡特金主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真正目标，因而把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相混淆。王右木一度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阅读了《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的分析和批评后，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为了帮助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王右木在主编《人声》报不久，即邀请几位主编《平民之声》、宣扬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到家中交谈，向他们讲解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并介绍一些批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让他们阅读。后来，王右木还多次同他们交流思想，促使这几位青年学生思想发生了转变，有的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四川革命运动的骨干。

《人声》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军阀和封建主义，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在出版到第三期时，被四川省警察厅以“言论纯为鼓吹社会主义而作”的罪名而勒令停刊。后经王右木的抗争，报纸得以复刊，但是，由于当局的不断压迫和经费的困难，报纸从始出日刊继而改为周刊，最后改为旬刊，但仍难以支撑，在断断续续出版了五个多月后被迫停刊。

王右木通过组织成都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and 创办《人声》报，在四川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联系和团结了四川一批进步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后来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四川早期的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成员和受到《人声》报影响的进步青年。

恽代英、萧楚女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五四运动以后，除了王右木在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外，中国共产党的早

期党员、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湖北武昌人）和萧楚女（湖北汉阳人），也先后来到四川，在川南、川东以及川西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1年驻泸县（今泸州）的川军第九师师长兼永宁（川南）道尹杨森，提出“推行新政，建设新川南”的口号，拟进行社会改革。为推行教育改革，他聘请成都《川报》主笔、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卢思（卢作孚）为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卢作孚与重庆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陈愚生共同商量后，推荐同为少年学会会员的王德熙和恽代英，分别担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与教务主任。10月，恽代英离开武汉抵达重庆，即应联合中学和川东师范学校的邀请，作了《青年应该怎样做》的讲演。在讲演中，他强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青年肩负起振兴中华的责任。其后，恽代英抵达泸县，就任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英语教员。

川南师范是川南地区最高学府，但沿袭一套陈旧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恽代英到校后即大刀阔斧地对其进行了改革。为了打破学校由校长专权的封建体制，恽代英提出学校公有，主张财政公开，用人须得学生同意，矫正过去校长中饱私囊及任用亲信的弊端。在他的倡导下，学校设立了由教师、学生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对学校各种计划及款项的支配，进行决定和实施。校务委员会组成经济委员会，查核用款情况，实行经济公开。学校聘请或续聘某教职员，要征求学生意见，学生可以“择师”，学生若不愿聘请或续聘某教职员，如有三分之二不赞成，就不得聘请或续聘；同时也不得无故撤换教师。通过恽代英发起的改革，学校建立起民主制度和新型师生关系。1922年春，王德熙调任富顺县知事，恽代英继任校长后，继续进行教育改革，先后聘请由武汉、重庆、成都、上海等地而来的革命青年李求实、刘愿庵、穆济波等为教师，使学校充满了民主空气，吸引了许多青年学子踊跃报考，以致学校不得不在泸县城郊忠山设立分校。在办好川南师范学校的同时，恽代英还积极支持泸县开设平民夜校，免费招收贫苦青年学习，普及文化教育；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招收冲破封建礼教的女青年。